

愛國教育薪火相傳 培養港青成棟樑之材



議論風生
龔俊龍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給香港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回信。習近平主席在回信中強調，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廣大香港同胞素有愛國愛港光榮傳統，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他希望學生們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起來，深刻認識世界發展大勢，深入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切實愛國情，厚植家國情懷，錘煉過硬本領，早日成長為堪大任的棟樑之才，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民族復興積極貢獻力量。

習近平主席的回信令人振奮，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青少年發展的關注和重視。正如受中央委託到培僑中學宣讀回信的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所指出，習主席在信中諄諄教導大家要與行結合，知世情與知

國情結合，家國情懷與過硬本領結合，成長成才與貢獻家國結合，充分體現了對香港青少年的親切關懷和祝福勉勵，對「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愛國傳統代代相傳的殷切期望。

習近平主席對香港青少年的關懷是持續的、深厚的、殷切的。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時，習主席專門抽時間到香港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暨青少年綜合訓練營，看望正在訓練的香港青少年，並與他們親切握手交談及合照留念。一年之後，習主席回信給少年警訊，信中表示：「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寄託在年輕一代身上。希望你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多學點歷史，多了解點國情，開闊視野，增長見識，錘煉本領，早日成才，以實際行動服務香港、報效國家。」

猶記得2022年，雖然香港正經歷新冠疫情，但習近平主席依然在香港特區回歸25周年之際親臨視察，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強調「青年

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希望特區政府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上面臨的實際困難。關注青年的議題，是習主席去年視察香港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共二十大報告，多番強調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青年，用黨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青年的發展，不僅關係到香港未來的發展，更關係到國家的未來發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中的重要力量。

這次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給習近平主席寫信，正是在香港回歸祖國26周年之際，即習主席視察香港後的一年，匯報參與學校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心得體會，表達繼續愛國愛港精神、為國家強盛和香港繁榮貢獻力量的決心。可見，過去

一年，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帶領下，在愛國主義教育、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是下了「苦功」，教育事業展現出全新的精神面貌。

習近平主席在回信中，有一點特別令筆者印象深刻，就是對學生通過參與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歸國安葬儀式、與「天宮」航天員互動等活動，更加深刻體會到身為中國人的自豪、身為香港年輕一代的使命與擔當，感到很欣慰。

全社會都要關心青年成長

事實上，隨著兩地恢復正常通關，香港不少團體都積極組織青少年到內地交流，讓香港青少年了解國家發展、深入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和機遇。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早前就攜手香港島校長聯會、九龍地域校長聯會、新界校長會，組織合共150名師生前往珠海市進行交流學習。此次參訪就是以珠海科技航空為主線，參觀了珠海太空中心以及中國膳食營養

補充標桿企業，讓學生們感受到國家航天科技的發展，先進的技術令人大開眼界。

鄭雁雄主任在宣讀回信時對各界提出了三個希望：希望同學們不辜負習主席的殷切期望，爭當偉大理想的追夢人；希望培僑中學秉持最鮮明的愛國特質，不斷提升青年學生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希望各界更加關心關愛青少年成長，為他們提供更大發展空間。

青年發展，需要政府、學校、民間組織多方面的協同合作，才能為青年的成長營造一個優良的環境，才能更好地引領香港青年學習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家國情懷，才能更深入推廣愛國主義教育事業。同時，亦期待香港每一個青年都投身到建設美好香港的行列中來，用火熱的青春書寫精彩的人生，描繪人生最美畫卷，書寫美好明天，更要成為實現民族復興的積極力量，成就國之棟樑。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妥善處理增收非本地生比例的問題



文教非常談
鄧飛

最近媒體報道，特區政府準備開放本地大學對非本地生的錄取比例，其中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即公立大學學位）的比例由現時的20%，大幅度調升到40%。雖然教育部門並沒有明確證實這個報道，但至少也沒有否認，提升非本地生錄取比例的措施，不僅得到本地院校的廣泛支持，而且也符合特區政府最近剛剛提出要把香港建設為區域性教育樞紐的政策願景，終究是大勢所趨，筆者樂見其成。雖然這項措施也不是沒有引起爭議之處，最多人憂慮的，莫過於會否搶了本地生升讀大學的機會和分薄了在大學校園內使用的各類資源。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教育界和社會人士已經討論甚多，筆者在此不再贅言。

需防止DSE認受性受損

我反而要提出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問題：就是當提升非本地生的錄取比例之時，那麼決定錄取與否的標準是什麼呢？尤其是要考慮到此舉對本地新高中文憑考試（簡稱DSE）帶來什麼衝擊影響？是否應在提升非本地生錄取比例的同時，要大幅度推廣DSE考試和教育在特區境外的認受性和就讀人數？這一個問題甚少為人所注意到，確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且聽我細細道來：

第一，如果這個40%的非本地生全部採用除DSE以外的考試成績，來決定錄取與否，那麼這等於用DSE來報讀本地大學的考生比例瞬間降低至60%。本地考生用DSE成績來報讀大學聯招，固然競爭變得更激烈，但筆者更關心的是，這意味著DSE在本地大學的認受程度變相降低，因為本地各大院校採用非DSE考試成績錄取的比例增加了，諸如B考試、GCSE考試和內地高考成绩等在香港的應用程度（用來篩選是否錄取該考試成績的考生）進一步提高，此消彼長，DSE應用普及程度自然就下降了。

今個學年報考DSE的本地考生人數短暫提升到超過四萬人，但這只是短暫現象。隨著結構性人口問題的持續，將來報考DSE的本地考生人數只會逐年下降。如果再加上DSE考試在本地大學

的應用程度下降，那麼未來DSE的整體認受性就下降，直接影響到四百多所開辦DSE課程的本地公營中學，最終也為衝擊六百多所本地公營小學，那很可能導致在未來會強化一個目前已經出現的趨勢：就是有更多本來就讀公營學校DSE課程的學生，「跳船」轉往有開辦非DSE課程的直接資助學校和國際學校。

疫情之前的2018至19學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用IB等非本地DSE成績錄取的醫科生人數，超過了20%的界線，達到51%，用DSE成績反而只錄取了49%。這本身並沒有違規，20%的非本地生錄取比例限制是指整個大學整體各個學系收生的比例限制，不是說每個學院、學系都要鎖定20%。但當時也引起了社會相當的關注和議論。如果將來從20%提升到40%，又會怎麼樣呢？

第二，這不僅影響到本地中小學基礎教育的課程穩定性，同時帶來教育公平性問題：受政府資助而免費的本地DSE課程，漸漸比不上自負盈虧、價錢不菲的各類非本地課程和考試。前者主要服務於基層學生，後者服務於家境優越的中上階層學生。這種階層分流，固然永恆存在，但政府的政策不宜加大這種分流程度。隨着用DSE成績和非DSE成績錄取大學的比例發生變化，就會演變成基層學生錄取比例和上中階層學生錄取比例的變化，這一點要非常小心處理。

第三，需要大幅度增加目前20%、將來40%（如果真的要提升的話）非本地生錄取成績的透明度。錄取非本地生不是如本地生那樣，採取大學聯招系統的統一招生辦法，而是讓各間大學自主招生，也就是說，非本地生或者使用非DSE考試的本地生，報考心儀的本地大學之時，需要逐間去申請，本地大學也是對他們作逐個甄別篩選，因為這些持有非DSE考試成績的報考者，各有不同的課程考試成績，所以難以如大學聯招這種統一平台，可以全部公布各個大學和學系的DSE成績要求（事實上也不是官方公布，而是民間教育團體整理公布）。在同一間大學、同一個學系招生中，本地生用DSE錄取的成績要求清晰明瞭。但如果用非DSE成績申請的非本地生，這些不同的考試成績之間就無法作直接比較了，何況目前大學也沒有公布這些課程考試的錄取成績。

這裏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來自內地的報讀學生越來越多，他們固然主要用內地高考成绩來

報讀本地大學，但隨着DSE在內地的認受性越來越高，未來報考DSE課程、用DSE成績報讀本地大學的內地生也會越來越多。但這些內地生即使用DSE成績來報考本地大學，按照規定也是屬於非本地生，也就是說目前歸入20%比例，將來歸入40%。這就變成了兩種錄取成績的比較：

首先是本地生的DSE錄取成績要求和非本地生（主要是內地生）的DSE錄取成績要求，這兩者肯定不同，即使兩者報讀的大學和學系是一樣的。2018學年DSE放榜之後，媒體報道，幾位用DSE成績報讀本地大學的內地生，被本地大學拒絕錄取，而這幾位內地生的成績水平，不亞於被錄取的本地生的成績水平，因此投訴被不公對待。但其實當局在處理上並無不當，因為雖然彼此同用DSE成績報考大學，但本地生佔80%比例，且統一辦理招生；非本地生佔20%，且必須逐個大學學系去報名申請，兩者成績要求自然大相逕庭。據考評局資料，非本地生報考DSE人數，截至2022年12月，持非香港身份證報考2023年文憑試的考生共有299人，目前人數不算很多，但當比例提升到40%之時，未來報考人數可期，上述同考不同取（錄）現象，將會變得越來越尖銳！

明確標準增加透明度

其次是非本地課程考試之間的成績公布，尤其對比DSE。無論是目前的20%，還是未來的40%，非本地生或者非本地課程考試之間的成績公布，教育當局應該責成本地大學，盡量保持高的透明度。每一間大學、每一個學系，用IB成績、GCSE成績、內地高考成绩、DSE等成績，各自錄取了多少非本地生？各自不同成績標準是什麼？正如香港學生回內地升讀大學，教育局的資料做得非常精細：每一間內地大學、每一個專業（相對於學系），錄取了多少港生，有多少港生用DSE成績免試錄取，最高錄取成績和最低錄取成績，一本《內地高校招收指南》包羅萬有，有着極高的透明度。那麼可否用同樣的透明度來公布本地大學對非本地生的各類考試成績要求？

最後結論，一言蔽之，擴大非本地生錄取比例，大勢所趨，有利於打造區域性、國際性高等教育樞紐，但不要顧此失彼，削弱本地DSE課程的接受程度。拓展DSE應該與拓展非本地生同步前進！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尋覓合理平衡點



靜思明路
湯家驊

我愛大自然。正因如此，在我學成歸港後，除了第一年住在市區外，我一直住在郊外。但在香港這個寸金寸土的屎屎森林，要每天能親近大自然實在不是那麼容易。國家在近代發展過程中也曾遇上這問題。但是從前說什麼「只要金山銀山，不管綠水青山」，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今天已改變成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國家早在1992年推動《生物多樣性公約》，並成為締約國。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概念；換言之，生態、環境、保育和修復已成為現代國家策略。去年12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舉行了第十五次會議，訂訂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並定下了二十三年2030年需達到之全球性目標。

從國家把大自然放在物質主義之前，可見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日常生活上確是有異於西方。我們雖然起步遲，但我們是發展中走向小康的國家。我們着重的是整體利益，是與生態環境穩健共存，這與西方價值觀比較着重個人自由和利益頗有分別。也許這是因為西方社會奉行資本主義或着重物質主義的結果，也許這是他們着重所謂個人自由，令這種價值觀影響了每個人人生觀的結果。

特區回歸前在百多年的港英管治下，或多或少也受到了這種價值觀薰陶的影響。主權是回歸了，但是這種文化差異有沒有隨着回歸而有改變，在今天而言，答案似乎是難以肯定的。

無論如何，今天已有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二百多國家簽署《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這代表着在中國努力推動下，大自然保育及維護生態多樣化已成為了國際共同價值觀，餘下的工作將集中於如何在各不同地區落實這《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下之二十三個全球性目標。

特區政府最近提出要適時追上《昆明—蒙特利爾生物多樣性框架》下要求的二十三個目標。這是一個頗為高的目標；例如修復30%退化區、污染減少50%、大幅提高藍、綠空間面積及質量等，對我們來說均是極具挑戰性的目標。我們面對最大的挑戰，是房屋需求問題。政府多年來一直面對增加屋地的壓力；因此很多時取易避難，在建屋與保育或綠化之間偏向迎合大眾需求一方，加上香港人普遍對西方個人利益文化的堅持，實在對持續成效不敢奢望。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今天不做則永遠幹不成，政府需要視野和勇氣，迎難而上，尋覓合理的平衡點，最終成功達至《昆明—蒙特利爾生物多樣性框架》下的全球性目標。希望今天便是一個好的開始。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

馬凱碩的良言西方聽懂了嗎？

新聞背後
章名

新加坡資深外交家馬凱碩早前在一個座談會上指出，未來十年全球將「毫無疑問」會經歷巨大的動盪，並形容這是全球秩序三大深層次矛盾同時爆發的結果。為這場「巨大動盪」做好準備，中國只能繼續堅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堅持多邊主義，與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廣結朋友。而作為國家一部分的香港，與國家命運共榮，更要發揮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馬凱碩不僅是資深的新加坡外交官，更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及安理會主席多年。同時，新加坡在國際問題上一直保持相對中立地位，馬凱碩對一些國際形勢的分析，受到各方的重視。由這位重量級國際學者提出的「動盪論」，自然不能輕易以危言聳聽視之。

馬凱碩作為論據提出的三個深層次矛盾，首當其衝便是中美矛盾，他特別提出了現時美國內部的反華風氣，形容「民主

黨和共和黨正爭先恐後地展示誰更反華，這成了一種競賽」，反華已變成了美國堅定的共識，如果有人敢提出異議，在華盛頓便會完全被邊緣化，甚至被戲稱作「熊貓擁護者」。現時美國這種非理性的反華氛圍，正是中美關係陷入瓶頸的核心。

反華立場損害西方利益

第二個矛盾，是西方與非西方的矛盾。這裏有兩個典型例子，1992年，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佔全球GDP超過四成，但來到今天G7僅佔30%不到，而由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組成的金磚五國，GDP佔全球比例已逾五成。另一個例子，是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這兩個分別有近八十年的組織，一直被視為執掌全球經濟機構。然而近八十年来，IMF總裁無一例外是歐洲人、世界銀行至今十四任行長中，僅一人並非美國人。當東進西退成為事實，西方仍不願意與非西方國家分享權力，產生矛盾也是理

所當然。

第三組矛盾，是亞洲內部矛盾，而且主要體現在中國和印度兩大經濟身上。一直以來的假設是，即使中印兩國崛起，也可以和平共處。但自2020年中印邊境發生衝突開始，兩國間的關係雖然算不上差，但也不算好。因此，亞洲內部也有需要解決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馬凱碩提出的這三組矛盾中，都存在着中國因素。這也間接說明，在應對未來的全球動盪中，中國扮演着至為重要的角色。

中國與美國不同，後者從特朗普時代起就所謂不斷往盟友背後「插刀」，從一開始就任性退群，到盟友國家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即使拜登上任後，雖然聲稱要重新重視盟友關係，放棄單邊主義，但實際上卻搶走了法國660億美元的潛艇大單、用高四倍的價格向歐洲出售能源、出台嚴重損害歐洲利益的《反通脹法案》、強迫歐洲和中國打科技戰卻沒有任何補償等等。

種種舉動都揭示着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霸道一面，並親手將盟友推離自身，至少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公開主張要實現歐洲戰略自主。

中國堅定走互惠合作道路

中國走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由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東協自由貿易磋商，到「一帶一路」戰略，中國一直在世界各地廣交好友，並通過以互惠互利的合作形式來贏得支持。例如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巨大投資，為非洲新增和升級逾一萬公里鐵路、近10萬公里公路、近千座橋樑、近百個港口，還有大量醫院和學校，累計創造就業崗位超過450萬個。在非洲贏得扎扎實實的好口碑。諷刺的是，中國與非洲的合作，還間接幫助歐洲紓緩了過去的非洲難民問題。

中美兩種不同戰略的發展結果是，現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量已經超過與美國的貿易量。近期歐洲多國政要、

美國巨賈輪番訪華，即使嘴上不說，但也很明顯已「用腳投票」。這亦說明中國未來必須繼續堅持多邊主義，着力推動經濟增長。中國本身擁有的超大規模市場，正是吸引與其他國家合作的重大因素。因此，拚經濟便是現時中國擁有的「最大武器」，中國經濟發展得越好，就越能提升自身影響力，也就越能在外交關係中取得主導權。

對香港來說，這些國際形勢關係看似非常遙遠，但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作為全球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責任便是善用「一國兩制」優勢，提升自身和國家的國際地位，主動對接「一帶一路」、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香港要提升國際地位，就必須充分利用「背靠祖國」優越地位，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依託。而當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越緊密，自然就能收穫越大的國際吸引力。即使未來面對巨大動盪，也能有效應對一切難關。